

第 10 卷第 3 期 2017 年 8 月

Vol. 10, No. 3, August, 2017

# 国际高等教育

## 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时代的国际化危机

对“他者”的强烈反对.....	91
特朗普与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革命.....	93
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时期的学术人员流动性? .....	95

## 排名

排名带来了更好的绩效吗? .....	97
在大众化时代追求排名: 对大多数人而言——忘掉它吧.....	100

## 学术职业

美国学术职业处境危险.....	103
塔吉克斯坦: 大学挑战与教授.....	105

## 国际问题

使“间隔年”成为现实: 六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107
引入国际分校是否有益? 阿布扎比的科研能力.....	109

## 非洲焦点

南苏丹的高等教育: 与挑战共存.....	112
非洲大学工程专业中的性别不平等.....	115

## 学生流动

蒙古: 高等教育与流动.....	117
跨境学习: 数据给予我们的信息.....	119

## 拉丁美洲问题

巴西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困境.....	122
哥伦比亚: 快速变化的挑战.....	124

新书速递 .....	126
------------	-----



## 对“他者”的强烈反对

Gary Rhoades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grhoades@email.arizona.edu

西方政治对高等教育有着深刻影响，它强烈反对“他者”，抵制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民族以外的群体，这是西方政治的标志，也是其错误所在。在过去一年席卷全球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中，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已显现出来。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候选人挑战了老牌政党、机构（包括大学）、有关人员和物品自由流动的正统观念，以及渐增的国际化 and 多样化所带来的益处。这种民族主义势头的反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社会民主契约和福利国家的政治解构相互影响。在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公共部门机构进行系统性的攻击和缩资中，这一点显而易见。

### 反国际化

反国际化是全球性的。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和地区中，无论是就英国脱欧还是欧洲共同体而言，还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 (Norbert Hofer)，或是法国国民阵线党 (France's National Front party) 领导人马琳·勒庞 (Marine Le Pen) 的竞选活动和政党宣言中，都存在反对移民（包括迁出和移入该国）、穆斯林及多元文化主义观点。在其核心及其最糟的情况下，这些活动都体现了国家和人类历史上最丑陋和最黑暗的元素。而且，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强大的主题，即通过对当下和未来流入的人口和思想

的反对，即宣扬它们动摇了历史文化的主导地位，来维护一国历史文化理想化的荣耀。

### 这对大学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这些竞选活动上，基本上看不到大学的身影或是它们根本没有发言权。然而，右翼民粹主义反动的的话语、政策和做法与大学所支持的东西是对立的。更重要的是，像减少教育经费的主流政治派别（如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一样，右翼民粹主义者把高等教育作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的一部分。事实上，大学倡导的先进的、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意识形态及其国际主义被贬低且被妖魔化，并被作为减少公众支持的理由。在体现进步性和包容性的情况下，因为高等教育招募、聘用、接受“他者”甚至赞美此类“他者”和差异，使得公共高等教育成为右翼煽动者和理论家的眼中钉。

由于大学近年来在上述方面变得更加多元化，所以政府拨款相对较少。美国是这一现象最为明显的例子，美国的人口变化同时也伴随着公共投资的缩减。尽管仍存在不公平现象，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学生人数（低收入、有色人种学生和移民）的增加，同时公共资金的不断减少，也反映了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发展。这种模式在欧洲并不明显，在这些国家，国内少数族裔进入大学的比例很低。然而，有一些证据表明，即使当地社区

和国家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国际学生的招生人数仍会增加。这在英国尤为如此。整个欧洲大陆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大学和教育机构更有可能清晰表达并支持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所说的 Willkommenskultur（欢迎文化）。

### 重新聚焦阶级不平等、接纳“他者”

与此同时，大学也有另一面，正如右翼民粹主义一样。大学有排除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的悠久历史。对于民粹主义者，大学也是组织的一部分——他们是软弱的精英。这种描述也并非完全不准确。

尽管高等教育机会扩大到工薪阶层家庭的子女之中，但许多大学仍然在服务国家和全球精英上付出最多努力。此外，像企业业务一样，当国内潜在消费者（即在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学生）市场停滞不前时，大学便极力转向那些家庭条件富裕的国际学生市场。无论是欧洲的“伊拉斯谟”（Erasmus）项目还是普遍留学项目，国际留学生都比其他学生更有可能具备有利的经济和教育背景。

那么，从家庭的社会阶级情况来看，谁能从国际化中受益呢？招收最有特权的国际学生的院校往往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在它们社区的本地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没有特权。大多数精英大学具备文化多样性，至少他们可以通过增加其城市中不同种族和民族背景的低收入学生的入学机会、通过招收相对更享

有特权的国际学生，或者在美国的情况下，招收州外学生，从而增加文化多样性。

最近，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发布了一份关于英国脱欧对剑桥以及对英国高等教育不利影响的报道。我并不认为工业中部地区的一般工薪阶层家庭（即那些受到了“新经济”中几十年经济动荡和下滑重击的家庭）将为剑桥大学或大学教师唱一首悲伤的歌曲。剑桥也不会有15~2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谁获得主要利益以及谁来进行艰苦劳动上，新经济似乎与旧经济非常相似。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不平等在国际上越来越多，这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制度和院校变得紧张。大学学者和行政人员必须加倍努力，并开拓新的办法以更有效地反对仇外心理（种族主义、歧视和同性恋恐慌），这些术语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右翼民粹主义。但是，民粹主义把我们放置在了相对少数的人可以拥有而大多数人无权享受特权的国家之中，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学到教训，并致力于改善令学术界和社会困扰的社会阶级分化。

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以更充分地实现我们的社会责任，从而使我们所在的社会民主化。这意味着重新平衡并加强全球和本土关系，增加国内和国际社会阶层中“他者”的机会并提升其生活质量。事实上，这些“他者”至今仍然因为我们的政策、实践和信仰体系而在教育中被人相对忽视和遗忘。

## 特朗普与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革命

Philip G. Altbach, Hans de Wit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近几个月来, 我们看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的巨大变化: 这种高等教育国际化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得到巩固且迅速扩展。最近的“微型海啸”指的是针对七个主要穆斯林国家公民进入美国所实行的若干限制, 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破坏。英国脱欧、波兰和匈牙利内向型民族主义政府以及欧洲民粹主义权利的兴起, 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虽然一些观察家认为目前的模式将会持续, 但我们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并不认为流动性将会结束, 或者学术界本身会放弃国际化发展目标, 当然也不认同最近进入国际化“市场”的商业利益将会停止。但我们确信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变革时期的开端。

必须牢记的是,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套概念和一系列的运作方案。这些概念包括承认全球化的积极因素, 并认识到它是世界经济的永久性因素; 致力于理解全球化; 尊重不同文化, 并且是一个欢迎不同政治、文化和经济伙伴之间的合作的开放社会。国际化也常常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国际化的运营近年来已经成为了巨大的事业——数十亿美元、欧元和其他货币用于国际化计划, 大学、私人公司以及广泛的提供商、保险公司、招聘人员获得了利益。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 328 亿美元。而英国大学

目前从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中获得其总收入的八分之一。这些学生每年为英国经济贡献约 70 亿英镑。

虽然近年来国际化的理想主义层面已在商业化和利益谋取的背景下得到了改变, 但基本目标仍相当稳定。总的来说, 学术界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些积极的目标。国际化的目标可能会被严重颠覆, 这对国际流动学生、寻求海外流动或协作的学者以及在各个方​​面依赖流动性收入的大学和政府都有重大影响。由欧洲和美国大学主办的全球 200 多个国际分校的未来 (许多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可能会受到威胁。

### 外部现实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限制显示, 全球政治现实正在改变。有望进一步实施“极端审查”。英国政府关于将国际学生定义为移民的政策变化也带来了不稳定性。在一些欧洲国家, 学生和学术流动的作用和政策在未来可能会有所变化。在欧洲领航计划“伊拉斯谟”(ERASMUS) 诞生 35 周年之际, 该计划以及其他科研合作和高等教育能力建设计划的未来可能受到威胁, 或将会面临严重的预算削减, 这是由于右翼党派及其支持者反欧情绪的滋长。在西方, “边界关闭”的趋势, 或至少是加强限制, 可能会越来越多。受西方

歧视政策影响的国家是否会采取报复行为尚不清楚,这会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一种“贸易战争”。

也有反例的存在。加拿大明确表示将继续保持开放并扩展国际流动计划,为其他国家的毕业生保留获得公民资格的途径。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会加强其吸引国际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政策。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中以及这些地区之间流动性加强的现状还将延续。

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梅和其他人的说辞及政策甚至不需要得到充分实施。敌对行为和歧视性做法的发生、过境骚扰事件、获得签证的难度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将会影响人们对流动性和国际化的看法。这些事件已产生不良影响,现已是覆水难收。

国际化被视为是西方概念,主要有利于发达国家。随着西方紧闭国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下一次革命可能会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发生。

## 可能出现的影响

虽然无法预测上述趋势的确切影响,但似乎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 学生流动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影响英美的市场份额,而这些市场早已出现学生流动下降趋势。
- 美国和英国以及其他带有排外心理的欧洲国家的全球观念将受到损害,削弱了

这些国家在全球学术排名、科研合作和高等教育声望其他方面的主导地位。

- 美国和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可能会受到最大影响,公共资金进一步缩减,自费国际学生人数也会下降。

- 已经面临着人数挑战且往往依赖于国际学生招生的较小规模大学和学院将面临关闭的风险。

- 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分校和其他形式的跨境教育将会停滞,而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大学将会填补其地位。在中东和其他地方,西方大学分校现在的承办国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它们。

- 美国“富布莱特”奖和欧洲“伊拉斯谟”等奖学金计划将遭遇大幅预算削减,这将减少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

- 已被认为是精英主义者的国际化,很可能只有著名大学才能实现。

同时,我们将看到许多美国、欧洲的大学及其师生抵制这些趋势,并采取主动行动,促进国际团结、合作和交流。全球公民身份,这一特朗普和梅否认的概念将成为大学争取自主和学术自由的关键因素。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学术领袖、教师和学生对特朗普政府施加限制的反应是他们反抗的明显表现。他们做出这些反应不是由于担心失去收入,而是因为他们忠诚于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

## 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时期的学术人员流动性?

Liudvika Leisyte, Anna-Lena Rose

Liudvika Leisyte: 高等教育教授

电子邮箱: liudvika.leisyte@tu-dortmund.de

Anna-Lena Rose: 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ortmund) 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教学助理、博士生

电子邮箱: anna-lena.rose@tu-dortmund.de

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流动性和吸引力越来越多地与追求卓越、动态创造、国际网络、增强科学表现、增加知识和技术转让, 最终改善经济和社会福利等事宜相关联。高等教育机构的成功, 以高素质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吸引大量研究资助来进行衡量, 取决于其所聘用的学术人员。在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中, 吸引有才华的学术人员的能力是全球大学和经济体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 目前政治发展的特点是渐增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倾向和强大的反移民话语, 这可能会导致国际学术人员流动的传统模式发生重大转变。

### 传统流动模式

奥地利和英国 (其中 25% 的学术人员是外国人)、丹麦、爱尔兰、荷兰和挪威 (30%), 卢森堡和瑞士 (超过 50%) 是目前欧洲吸引大多数外国学术人才的国家。2016 年“科学与工程指数” (the 2016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表明, 美国一半以上的博士后工作人员出生于国外。然而, 现有的学术流动模式往往会加剧上述提及的学术中心及“学术边缘”地区 (用阿特巴赫 [Altbach] 的话来说) 间的不平等现象, 后者通常位于较小的、地理位置偏远的以及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 且构成了对国际学术人员具有较小

吸引力的目的地。国际学术人员流动的人才流入和人才流失动态的传统失败者包括中欧和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许多发展中国家。

我们最近针对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学术人员流动模式的研究表明, 这些国家努力保留并吸引学术人才的实践, 导致了主要的出境流动。此次研究对象为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和立陶宛, 它们是传统上的封闭系统, 以转型经济、特有文化和历史以及民族语言保护主义为特征。从国外吸引有才华的学术人员的主要障碍包括薪资水平较低、招聘和晋升程序缺乏透明度, 裙带关系和学术近亲繁殖程度高, 以及老一辈本地学术人员缺乏外语能力。在波罗的海国家, 特别是在拉脱维亚, 要求外国学术人员掌握当地语言造成了进一步的障碍。我们观察到流入中东欧国家的学者似乎受到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因素的驱动。较之于职业发展、获取知识和设备、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减少教学负担以及更多的研究时间, 访谈合作伙伴注意到, 个人关系和与家庭有关的因素, 或对目的国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特殊兴趣才是学者们流入该国的主要动机。

虽然最近的政策言论指出了吸引国外学术人才的必要性, 但缺乏具体措施, 且合法

的薪酬制度和移民法律框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以解决。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中欧和东欧国家已经通过欧盟结构性基金的投资大大改善了其科研基础设施。此外，中东欧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提供外语课程和项目——通常是英语的，这有助于外国学术人员参与教育活动。此外，越来越多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努力吸引国际学术人员在正常就业的基础上参与可选性方案，例如公私伙伴关系，由于这类活动提供了更好的报酬和更多的科研时间，对国际学术人员更有吸引力。

###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改变游戏规则？

全球许多国家目前已经看到渐增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趋势和强大的公共反移民话语，吸引和留住学术人才以确保欧洲和美国科学及高等教育体系竞争力的问题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鉴于诸如 2016 年的全民公投，该公投支持俗称为“英国脱欧”（Brexit）的行动以及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提出的移民政策，我们猜测流入两国的学者将会减少。此外，英国近期的报告显示，内政部已告知欧盟国家学者做出安排离开该国。如果外国学者迁居留在这些国家的动机和可能性有所下降，那么这会为其他国家增加人才队伍带来

新机遇吗？

由于人口数量减少、移民率上升（特别是青年人移民率上升）、学术力量老化，吸引外国学生和学术人员将成为确保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竞争力和最终生存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我们期望提高对改变国家和院校实践以及法律框架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吸引国际学术人员。在中欧和东欧国家中，爱沙尼亚是实施具体政策、在国家和院校层面明确招聘和吸引外国学术人才目标的最佳实践典范。从 2004 年加入欧盟直至 2014 年，爱沙尼亚外国学术人员的比例已增长了近 8 倍，达到 8% 以上。最近，波兰也在科学领域加大宣传力度，增加投入公开招募顶尖科学家，我们预计其他中东欧国家未来将会以此为

在诸如英、美等国家中，随着招聘和保留外国学术人才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中欧和东欧以及此前位于高等教育边缘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只要这些国家不跟随增加国家隔离的趋势，并期望在其区域中遵循积极的范例，即减少向内流动障碍，那么它们可能会大大增加其学术系统对海外学术人才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看到国际学术流动趋势的方向发生重大变化。



## 排名带来了更好的绩效吗？

Simon Marginso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国际高等教育教授、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 (ESRC/HEFC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s.marginson@ucl.ac.uk

全球排名仅有 13 年的历史,但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的永久组成部分;它已深深地改变了这一领域。全球排名不可避免。业内人士要了解高等教育,排名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它刻画了强弱排序并巩固了伙伴关系战略。它在科研能力上引导投资者。它或好或坏地影响了许多跨国学生和教师的生活决策——尽管大部分数据质量不佳,以及所有排名都有着不良影响。

全球排名将全球高等教育视为关系环境,放大了该环境的一些潜力并阻止了其他人或机构的进入。它以三种方式实现这种影响。一是竞争:排名将高校作为大学和国家竞争市场的理念深印于全球意识之中。这种竞争有关科研表现,这是排名结果以及声誉的主要推动力。第二,层级:排名是估值体系的核心要素,据此,不平等的权重被分配到知识和毕业生进入国家和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证书之中。通过排名,大学与政治经济、劳动力市场以及它们所处的不平等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第三,绩效:排名已经安置了一个控制行为的绩效经济,助长了每所院校持续改进的狂热文化。

### 不平等竞争

在科研和毕业生劳动标准中自然有着竞争性因素。但排名赋予竞争更强大、更原始

的形式,排名将竞争纳入指标和激励措施之中。排名使竞争成为许多大学校长和副校长的主要战略。因此,系统内的团结与合作被削弱了。

无论排名结果如何,我们继续开展合作。这些指标包括在出版中的智力协作,尽管这通常被解释为自利(联合出版以扩大引用率)。但重要的是,全球高等教育中引人注目的集体资源数量巨大且越来越多的份额被置入了相互冲突之中。

排名中形成的价值层级进一步阻碍了合作。虽然排名关注基于科研和学习的跨境自由流动,但它们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有一个明确的地位层级。定义这个层级结构的不是一个评估资历或学习的全球系统。并不存在全球资质系统。我们不在对比的基础上测量学习。把全球层级系统化的是整理、评级和排序知识的过程,并通过全球排名进行总结和广泛传播。

知识按照期刊指标和层次、出版物指标、引文指标和层次排序,并以排名为主,主要基于科研。科研表现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the Shanghai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莱顿排名”(the Leiden ranking)和“Scimago 大学排名”(Scimago)的全部内容,也是“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中三分

之二以上的内容。排名将科研中的现状经济转化为制度层次，确定每个知识生产者的价值，从而确定其产品的价值。知识指标和排名循环利用最强大学的主导地位。

## 更好的绩效？

绩效提升意味着什么？这是竞争的最终理由。如果排名取决于实际的大学绩效，并且是衡量大学的重要内容，那么更好的排名位次就意味着提高绩效。如果每所大学都力争获得更高的排名位次，那它们必须提升绩效。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吗？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从排名到战略、改进工作、更好绩效，然后回到更好的排名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一个良性循环。但也存在问题。排名中只包括一些大学活动。教学和学习没有在这个良性循环之中，这是绩效驱动中的一个缺口。许多科研指标都在良性循环内，但这些指标不存在于人文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和大多数专业学科中，且英语以外的所有学术工作都被排除在外。那科学呢？一些排名推动绩效，其他则没有。依赖于出版和引文连贯性指标的排名带来了更多且更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其他各方面都相同（例如“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莱顿排名”和 Scimago）。自 2003 年以来，以科研为基础的排名已促进了大学科学能力投入的增加以及院校战略科研成果的增多。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和“QS 世界大学排名”使这一情况更加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借鉴了强大的科研指标，就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单独来看，QS 的师均引用指标，以及“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的引文和科研量指标可能会产生这种影响。“可能”是因为激励措施比较弱：基于科研的指标在多重指

标的组合之中被掩盖了。

国际化指标产生激励措施，增加国外学生和教职人员以及联合出版物的数量，但在总排名中这个方面却是次要的，并且，绩效激励在多重指标的其他要素中被掩盖了。

因此，一所大学可能会提高其师均引用绩效，或增加其国际化数量，但却会因为声誉调查导致排名位次的下降。声誉调查构成了“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和 QS 排名中的一大部分，但却与实际绩效关系不大。调查包含有关院校绩效的主观数据，而非有关绩效的实际数据。对良性循环至关重要的努力、改进和排名之间的联系被打破了。当排名位次由于方法论的微小变化而改变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并且，努力、绩效和排名之间并无紧密联系。

你可能会说，声誉对学生很重要。程度数值受强弱排序的影响。事实正是如此。基于调查的声誉层级本身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但却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声誉排名本身，尽管相当有趣，却不能以实质性的方式持续提升绩效。它只能驱动位次和市场的博弈。最终，声誉必须以实际表现为基础，持续服务于利益相关者及公众利益。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类比来提出这一论点。获得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取决于在现场指定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进球。如果现在国际足联改变规则呢？不再奖励最终成绩——即获得最多进球的球队，转而变为将 50% 的分数给予最终进球数，50% 的分数给予那些在调查中被认为是最佳球队的团队。那么，我们对结果的信任度就会比较低，不正是这样吗？

多指标排名提供了大量的数据集，但由于每个领域的努力和排名结果之间的联系并不透明，所以不能一致地提升绩效。激励因

素向不同方向产生拉力，效果是不可见的。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不同指标相关度较好；它们朝着同一个方向拉动并共享同样的绩效驱动力。但 QS 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使用的是各类不同的指标。

另一方面，如果多指标排名分解开来，各个指标可以有效推动绩效改善。那么，至少排名竞争将指向更好结果而非为了自身声誉。

## 在大众化时代追求排名：对大多数人而言——忘掉它吧

Philip G. Altbach, Ellen Hazelkorn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高等教育署 (the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 政策顾问、都柏林理工学院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HEPRU) 荣誉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论据：更多世界各地的大学公开承认，目前痴迷于在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全球大学排名中获得地位。它们现在应该放弃这一做法。

虽然有些学校可能会跻身排名榜单，或可能会稍微提高排名位次，但就所需的资源，或是在使命或学术课程中的重大变化而言，这几乎都是不值得的。事实上，大多数“收益”都源自各种排名方法论上的变化，其目的是留在媒体和公众的头条，从而在商业上有利可图。

我们的建议对于中等规模的国家、地区和专科院校及其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尤其重要。现在，由于要满足高等教育的人口需求以及对受过高等教育公民的社会和经济要求的组合，以上这类院校构成了全球绝大多数的高校。事实上，预测表明，高等教育学生人数预计将从 2000 年的 9 940 万人增加到 2030 年的 4.142 亿人，将增长 316%。容纳这些额外的学生则需要在未来十五年中每周开放四所以上主要的大学（每所容纳 30 000 名学生）。

这些高校是社会及其地区的真正支柱。作为社会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体院校和重

要基础，它们将开发一些科研重点，但不太可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点。

然而，我们的建议甚至延伸到那些采用“旗舰”名号的大学——这些大学在其国家或州的社会层级的顶端。这是因为排名贬低了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即确保学生和毕业生在其越来越长的生命历程中获得成功、满意和积极的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 全球排名测量什么——以及不测量什么

现在广为人知的世界三大大学排名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又称“上海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s) 和“QS 世界大学排名”，它们主要评估了两个方面的：科研生产力和在同行、雇主和学生中的声誉 (ARWU 除外)。“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有 90%、QS 中有 70% 的内容用于测量科研水平，而分别又有 33% 和 50% 的内容测量声誉。“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采用主观声誉调查测量教学质量，但一个人如何在课堂外评估教学能力，这一点尚不清楚。国际化使得数量比质量更重要，这

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瑞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欧洲联盟开发的“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U-Multirank)使用了更广泛的指标,但其接受度不如上述三大排名广泛,因此,它一直在争取更广泛的认可。而其他排名,如“莱顿排名”(the Leiden Rankings)的关注范围和领域更为狭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性和专科性的排名,包括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加拿大的麦克林(*Macleans*)、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日本的《朝日新闻》(*the Asahi Shimbun*)等出版物发布的排名,以及《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的“全球商学院排名”,印度尼西亚的“国际绿能世界大学排名”(the Green Metric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前者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数据集,但都遇到了方法问题。

### 为何大学应该忘记排名?

根据“世界高等教育数据库”(http://www.whed.net/home.php)统计,全球共有 1.8 万所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只有少部分学校会出现在排名榜单上,无论它们多么努力,投入多少资源。事实上,前 100 名大学仅占全球高校数量的 0.5%,其学生人数仅占全球学生数量的 0.4%。毫无疑问,跻身排名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但保持排名位次,甚至使位次上升则并非易事。学校期望排名位次上升,但位次的下降则是一个持续的问题——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宣传。

这是因为竞争激烈,排名上游的学校拥有丰富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用于开展工作。此外,排名有利于那些在科学、工程和医学方面有实力的大学。新成立的和较小的大学,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或是没有这些专业的学校,机会有限。同时,已处于排名顶端的大学继续改善。因此,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财力和其他资源,学术机构几乎不可能提高其排名位次。

### 排名带来的教训

排名对高等教育和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十几年的国际证据展现了它们如何影响决策、学术行为和资源配置;研究重点和学科实践,包括英文出版物和国际排名的期刊;招聘和晋升标准;组织架构和机构兼并。今天,许多大学都有一个排名战略和机构研究单位来评估排名表现。

由于过分强调科研和国际经验凸显了大学的使命和价值,与进入和/或攀爬排名榜的努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教学和本科生,以及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常在做决定或进行资源分配时处于次要地位。在一些大学中,优先关注和一些益处通常给予科研“明星”而非年长的或国内的教师。其他例子表明,大学如何尝试重新调整学生入学标准,使其变得更有选择性和排外性,以更好地满足排名的结果指标,如毕业率、毕业生就业或薪资水平、校友捐款等。但是,在做出这样的改变时,大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使命和目的。其他例子凸显了大学试图对其排名位次进行微乎其微的改变所带来的巨大财务成本——导致了巨额债务。

### 专注使命而非排名

我们最近的综合经验突出表明,排名已成为影响所有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甚至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最近也宣布不能忽视它们。尽管是在战区中,某所大学最近与一位排名方进行接触,因为它担心其在排

名中的地位变化。这类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大学寻求提升和保护学术自主权免受各种干涉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学愿意让其决定变得容易受到他人设定的议程的影响。

对威望和声誉的追逐，而非对质量和学生成就的追求，已成为主导驱动因素，加剧了社会分层和声誉差异化。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假设：指标和相关权重的选择是有意义的举措，但并无国际研究证据表明这是对的。

这个问题特别严重且令人担心，特别是对于绝大多数在排名中已被追赶上的、位于排名中部和底端的大学和学院而言。对于这些大学及其政府，我们认为：它们应集中精力在重要的方面，即帮助大多数学生获得可持续生活和就业的资质，而不是确保您的机构符合不同排名确定的标准。因为即便投入大量关注、消耗过多资源，结果也未必令人满意。

## 美国学术职业处境危险

Martin Finkelstein

美国西东大学 (Seton Hall University) 高等教育教授

电子邮箱: Martin.Finkelstein@shu.edu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质量上,美国都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当然,中国目前在学生入学数量上已超过美国,每年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数量也高于美国。在教学人员数量上也高于美国。印度正处于超越美国的边缘,至少是在入学人数方面。美国人宣称他们将保证教育质量,但这一宣言愈发处于危险之中。

### 新的评价

这就是对美国学术界现状和展望的新的详细分析:《教师因素》(2016 版)(*The Faculty Factor 2016*)。基于我们此前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教师》(2006 版)(*The American Faculty*, 2006)一书中所述的已经令人不安的恶化指标,我们的新书创造性地挖掘了新鲜的、甚至是以前无法使用的数据来源,通过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停留来追寻美国教师的命运。

对于那些没有日常体验美国体系的人来说,《教师因素》一书提供了一个清晰却微妙、有助于矫正对于理解典型的美国学术工作和职业的看法的途径。所谓典型的美国学术工作和职业模式源自克里斯托弗·詹克斯 (Christopher Jencks) 和大卫·雷斯曼 (David Reisman's) 的《学术革命》(1968 年)(*The Academic Revolution*), 鲍恩 (Bowen) 和舒斯特 (Schuster) 的《美国教授》(1986)(*American Professors*), 甚至是伯顿·克拉

克 (Burton Clark) 的《学术生活》(1987)(*Academic Life*)。该模式建立在共同治理、院校学术使命管理,包括学术事务中的最高教师权威,特别是招聘和晋升的人事问题等理念的基础上;建立在关于保护学术自由的终身教职的理念之上,该理念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规范了学术生涯的结构(包括六至七年的试用期,其次是高风险的“上升或出局”评估,结果是连续任用和相对稳定的职业生涯);以及综合学术功能的概念,包括在相互增强的协同动力中的教学、科研(通常是广泛界定的)和服务,且每个功能被视为强化了其他功能。

### 数字:新的模式

美国学术工作和职业发展的“新”模式建立在以下情况之上:愈发偶然的、分层的学术力量;传统综合功能分解为专门教学、科研和行政功能;校园教师权威,即便是在学术事务上,逐渐让步于全职专业管理人员。约 35% 的教学人员是全职、终身教职或就职于可授予终身教职的职位;约 50% 的人现在是兼职的(主要是临时教授一至两门课程);其余 15% 为全职固定合同职位,仅专注于教学、科研或是项目管理(不包括参与学术治理在内的服务)。由于教职人员的数量整体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也在增加,学术项目和政策的决策越来越多地由管理人员而不是教师制定,教师的影响力逐

渐缩小到部门甚至是项目层面。

我们主要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代人中，近五分之三的新进教师已经脱离了终身教职的道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一半的博士毕业生在临时的博士后职位上开始其职业生涯，只有幸运的少数人获得教职。四分之一的新入职教师可能会在第一次就业后的头三年内改变其工作和就业状况。脱离了终身教职道路的五分之二的全职教师在其第一个职业生涯的十年中离开了高等教育领域。人们进入学术界的合约类型，即全职或兼职、终身教职或固定期限，限制了其可能的职业发展轨迹。职业轨迹的渗透性最小。就职于工业领域和政府的人们迁入学术界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在整个系统中，美国学者，正如在其他国家中的学者那样，已经历了渐增的工作量，需要教授更多课程、更多学生，出版更多的科研出版物（最好是带着具有竞争力的外部科研基金），同时，越来越多地受到责任制的新要求。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不太有吸引力的工作境遇，不具希望的职业前景。尽管大多数标准、工作和职业满意度仍然很高，但已可以看出下滑的迹象。经过 90 年代中期短暂的实际增长，学术水平已经稳定下来，并刚刚开始从全球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最优秀的入门级职位（终身助理教授岗）的薪水不会使在职者的家庭收入达到中等家庭收入水平。新任教师，即使是全职雇员，也发现其在经济上处于边缘化地位。

## 国际基准

作为《国际高等教育》读者的福利，本卷包括两篇文章，主要根据“2007~2008 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调查”（the 2007~2008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Survey）的结果，明确地将美国教师置于国际视野之中。第一篇文章研究了美国教师教学和科研/出版活动内在化的趋势；第二篇文章明确地比较了美国教学人员与其他英语国家、西欧和东亚的教学、科研和治理情况。我们获得了什么信息呢？首先，美国教师大部分表现得孤立和内向，正如其在原来的卡内基基金会“1991~1992 年教学进展国际调查”（the Carnegie Foundation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1991~1992 International Survey）中所表现的一样。仅有约四分之一的教师在其教学和科研中融合了国际视野；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与国际同行合作。区分美国教师“国际主义者”的是他们的整体科研生产力及其扩展的专业跨国经验。与其他英语国家、欧洲和东亚地区的教师相比，美国的学术人员往往不太倾向于做研究，他们乐于在教学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发表较少文章，在所属学术单位之外的院校治理和教育公共政策中影响力较小，期望得到相对丰厚的补偿，以及处于相对满意的中间水平，而不是坚定地处于顶端。

最近出现的是一个愈发破碎且弱化的职业形象，威胁着美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卓越。在残酷的讽刺中（至少对美国人来说），全球许多国家都表明试图效仿美国模式，作为提高其在知识经济中的全球竞争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正眼睁睁看着其优势基础被削弱。



## 塔吉克斯坦：大学挑战与教授

Zumrad Kataeva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 (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教育  
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箱: zkataeva@hse.ru

塔吉克斯坦的高等教育正处于困难和挑战时期。塔吉克斯坦是一个面积较小的、处于内陆的相对孤立的国家，人口为 85 万。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接壤；其领土的 93% 被山地覆盖。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内战和莫斯科财政补贴的中止，中等和高等教育受到严重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政治稳定恢复之后，长期的教育改革开始了。前苏联的解体对后苏维埃国家在学术界的地位产生了不利影响，薪资和职业发展机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经济自由化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承诺带来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提供更多高等教育机会的公众呼吁。塔吉克斯坦的大学和学院急于聘请准备不足的教师，因为那些更具经验或有才华的教授纷纷转入了私营部门或是移居国外。留下来的教师开始在商业市场上销售商品或在几家可用的企业中工作，或者转入了国际组织中。然而，现在塔吉克斯坦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 38 所高等教育机构，近 9 000 名全职教职人员，16.7 万名学生。

### 薪酬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是前苏联最小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926 美元。高等教育预算来自国家和非国家资源，且越来越多地来自学费。大学校长的平均月薪约为 550 美元，部门助理人员的平均月薪仅为 69

美元，他们处于学术层级的底端。全职教授的工资每月约为 270 美元。虽然薪水逐渐增加，但仍不足以支付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

### 生存战略

由于教师和教职员工的薪酬与生活费用不符，所以学者们别无选择，只能寻找其他手段赚取收入。年轻的教师不想进入学术圈，因为他们知道大学的薪水很低。教师面临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迫使他们使用各种策略来求得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蓬勃发展遥不可及。最好的情况是，他们参与由国际组织支持的项目，作为笔译员、私人教师或在相关小企业中兼职。而糟糕的情况则是，他们成为市场上的销售人员，或者逃离自己的国家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那些没有额外工作的人由其父母和配偶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师对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并不感兴趣，因此，对于成为合格的导师的准备也不那么充分。此外，教师认为除教学外，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科研，而从事科研，他们需要足够的收入和时间；大多数人宁愿花时间寻找额外的收入以维持生存。

### 科研挑战

教师每周通常教授 15~20 个学时，这样的时间安排不允许他们追求自己的科研和满

足发文需求。因此，具有诸如副博士学位（kandidat nauk）和理学博士学位（doctor nauk）等学术学位的教职员数量正在减少。在经济崩溃和内战期间，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受到破坏。在冬天通常没有电；一些需要保存在一定温度下的书籍和期刊的卷宗没有保存下来。电子资源不容易获得，而且几乎没有以俄语为媒介出版的专业资源；几乎没有任何出版物在塔吉克斯坦出版。仅有几个俄罗斯网站是教师可以访问的，但即使是这些网站，也需要交费才能下载信息。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塔吉克斯坦的外部科研资金很少。也没有国家论文委员会可以授予学位。直到最近（2015年），所有需要批准的论文必须发送给俄罗斯高等认证委员会（the Russian Higher Attestation Commission）进行审核，这是教师自己也难以忍受的冗长且成本高昂的过程。

塔吉克斯坦大学也缺乏足够的教学和学习设施。许多教师在缺乏现代设备（如电脑和电子显示屏）的教室里工作；实验室也缺少为学生和年轻研究人员提供足够培训的现

代技术。鉴于塔吉克斯坦教师面临的所有专业和个人障碍，毫无疑问，只有少数年轻人才能进修和攻读高级学位。大多数人通常决定离开学术界，而非相信学术进修和这种投入的收益的过程。根据教育部统计结果显示，在塔吉克斯坦大学工作的教师中，仅有不到30%的人具备合适的最高学位以开展教学——尽管政府政策文件要求提高科研能力。

## 未来之路

尽管教师面对着残酷的条件和现实，但他们仍然喜爱为学生开展教学工作。这似乎是他们留下来的主要原因。然而，这种个人满足感似乎不足以激励下一代大学教师进入该行业。他们需要的是为其提供基本的工作条件和足够生活的薪水，以便可以充分致力于教学、科研、知识生产，并为国家未来发展培养合格的专家。塔吉克斯坦大学和政府需要努力建立合适的政策并提供足够的机会，使候选人能够重新获得学术界有价值的专业人员的地位，这是使其院校参与渐增的全球教育竞赛以创造知识社会的条件。

## 使“间隔年”成为现实：六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Doria Abdullah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博士后研究员、“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项目助理

电子邮箱: doria.abdullah@gmail.com

“间隔年”(gap year)是指旅游、工作或其他个人和职业发展机会的试验期。通常是在学生开始高等教育前进行的。学生可以在国内和国外开始间隔年,后者在参与者中具备更大的吸引力。这个概念对英美学生而言更为熟悉,在英美两国有着支持学生追求间隔年的高利润企业。

马来西亚将间隔年作为本科课程的一部分。高等教育部部长伊德里斯·朱索 (Idris Jusoh) 在 2017 年 1 月 12 日的新年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公告。从 2017 年开始,八所公立大学的本科生可以选择在学习期间休学一年。他们可以参加工业培训,追求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兴趣,也可以参与志愿工作。其目的是让学生接触社会,发现自己的潜力,并在智力上得到发展。他们的间隔年经历也将使其更适合于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

本文列出了六个相关问题,之后的间隔年选项将在 2017/2018 学年进入首个实施阶段。

### 问题一：意识

间隔年是一个新的概念,此前从未实施过。如果部长的政策声明是从字面上来看的,那么马来西亚的间隔年将不同于常规;必须明确界定并传达给本科生。学生也应该相信实行间隔年的优点,以及实现印象深刻且意义非凡的间隔年经历的不同方式。

家长在本科生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习惯了学习和毕业后就业的常规途径。要接受其子女从教育中脱身而去“看世界”的替代观念需要一段时间。大学应该与父母进行接触,特别是在入学的时候,对间隔年进行介绍并获得父母的认可。

### 问题二：时机

由于学生可能在学习期间开展间隔年活动,所以需要对时间进行一些澄清。应该在大学的第二年开展吗?那时学生已完成了其基础课程。可以在大学的第三年进行吗?那时学生已确定了自己想学的专业,并在行为举止上更加成熟。或者,一个学生能否将间隔年分成两部分,并在其第二和第三年的学习中夹杂间隔期?

### 问题三：设计

根据部长的讲话,学生们可以在间隔年期间在特定领域工作、做志愿者或是深化知识。学生应该选择三者之一呢,还是允许在选项之间进行切换?学生 A 可能选择在他/她的整个间隔年间在一家公司工作,而学生 B 可能更愿意在前六个月志愿参与一个社区项目,然后在公司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实习。应给予教师和学术顾问明确的指导方针,然后他们才能就最佳的间隔年设计提出建议。

#### 问题四：鼓励参与

抽出时间开展间隔年可能是件代价高昂的事情。根据资助机构设定的条件，学生可能在休假期间被暂停发放奖学金或学习贷款。大学可以在间隔年期间提供部分支持学生经济需求的奖学金或是补贴吗？

如果间隔年是选择性选项，那么可能只有少数勇敢的人才能应对挑战。大学如何奖励学生的此类实践？例如，学生的间隔年表现能否被转化成课程学分，这将有助于他们达到毕业要求？大学应考虑设立奖励措施，鼓励更多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开展间隔年。

#### 问题五：与现存项目一致

与大学国际合作伙伴在海外开展的志愿者计划可补充现有的间隔年计划。这将是增加参与境外学生流动的国内学生人数的好办法。因此，间隔年应与大学现有的国际化战略相结合。学院、学术管理办公室和国际办公室必须协调工作，共同努力，使间隔年成为全校性的国际化活动。

近年来，学生们已获得了企业家精神的基本知识，并且开展小型创业项目被要求作

为其学习的一部分。马来西亚政府甚至进一步向那些希望在学习期间成立公司的学生减免学费。那么，大学是否能够允许学生在间隔年期间成立公司并开展商业活动呢？

#### 问题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监督

大学必须有明确的吸引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战略。显然，具体实施需要几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社区领导人就适当的即将开展的项目进行投入，成为学生社区追求的推动者。大学职业办公室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技能开发模块，以帮助学生在间隔年做准备。业界人士应了解间隔年的理念，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工作经验。此外，必须建立明确的监测和评估机制，以确定执行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教育部引入间隔年政策的努力应该得到赞扬。这个想法令人兴奋且切实可行——只要有足够的信息，明确的沟通和良好的指导方针。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解决公立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的一个好办法，在就业所需的“软技能”上，公立大学学生可能落后于私立大学学生。

## 引入国际分校是否有益？阿布扎比的科研能力

Jason E. Lane、Hans Pohl

Jason E. Lane: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教育政策与领导部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Leadership) 主任、跨境教育研究小组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联合主任

电子信箱: Jason.Lane@suny.edu

Hans Pohl: 瑞典科研与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 (the Swedish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项目主任、跨境教育研究团队研究员

电子邮箱: hans.pohl@stint.se

许多国家和地方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提升其经济竞争力, 力图发展本地的科研能力。它们为推动这种意愿采取了各种方法。有的寻求增强现有院校的能力, 另一些则是追求新的战略, 如建立新的国内院校或引入科研生产力较强院校的国际分校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大部分政府都无法拥有足够的资源, 以采取多种方式来建设科研能力。极少数有资源的政府, 则可以有机会对比多种方式的结果。阿布扎比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且最为富裕的酋长国之一。阿布扎比有 20 多个地方性的, 主要是私立的高等教育机构, 其中一些是国际分校, 大多数学校都是在近 15 年中建立的。因此, 阿布扎比可以作为更好地理解公立、私立和外国院校科研成果的良好案例。

我们特别关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 这是一个 2008 年建立的国际分校, 带有早期的科研期望。在第一批学生入学之前,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研究所就已成立, 以支持纽约大学教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科研工作。今天, 研究所通过其 12 个中心和实验室的支持, 推

动了前沿和创新研究。由于其早期的科研重点和支持,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是国际分校的一个不寻常案例; 但是, 作为一个特例, 它可以为我们分析潜在科研贡献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

为了解这个问题, 我们使用爱思唯尔 (Elsevier) 提供的文献计量数据来跟踪阿布扎比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这些数据提供了每个机构教师出版物总数的信息以及这些出版物的相对质量, 这些出版物由“域加权引文索引” (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ndex) 确定, 这可以作为比较机构引文表现质量, 控制学科概况、出版年限和出版类型差异的方法。

### 阿布扎比的科研生产力

当我们只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院校在 2011~2015 年间的发文数量时, 阿布扎比显然是研究生产力的领头羊。在全国前十名最具效率的学术机构中, 其中六个位于阿布扎比, 其中包括前三名的院校。

在阿布扎比, 阿联酋大学 (UAE University) 发表了 3 000 多份出版物。阿联酋大学是全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院校,

始建于1976年，即国家刚刚成立之后，一直被视为国家公立研究型大学。接下来的三个最具生产力的机构（哈利法大学[Khalifa University]，马斯达尔研究所[Masdar Institute]以及石油研究所[Petroleum Institute]），每个都是私人管理和部分公共资助的，发文数量超过了第五个机构（即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两倍（或接近两倍），该校是位居前五名高校中唯一的国际分校，与哈利法大学和马斯达尔研究所大致同时开展科研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位于阿布扎比的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索邦大学（the Sorbonne）的分校，科研生产力水平较低，其发文量均少于20。

## 评估科研质量

当我们研究十大机构的发文质量（FWCI）时，结果有了转变，我们开始看到国际分校相互联系的潜在影响。阿联酋发文质量最高的机构是马斯达尔研究所，其次是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阿联酋大学下降到了第四名。虽然国际分校在发文量上并非是多产的，但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似乎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出。国际分校可能导致其质量指标高于其他国内机构的究竟是什么？

## 利用学术资本

引入国际分校的部分好处在于，它可以从主办院校的学术资本中受益，可能比新建的国内院校更快地发展质量研究文化。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不会像主校那样产出许多科研出版物，且可能永远不会。然而，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质量指标与主校水平相差无几，实际上在过去六年中有三年都高于主校。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但是可以预期发文类型和发文所在

期刊的质量，这一预期从主校延伸到国际分校。此外，相对于就职于新成立以及不太知名的国内机构的同事而言，主校的品牌，也即海外分校赖以提升地位的品牌声誉，也可能有助于提升分校中的发文受到的关注度。

## 协作

对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2015年国际合作发文约为80%，远高于主校。迄今为止，主要的国际合作者是主校，这为我们提供了国际分校受益于校园从属关系的更多证据。此外，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教师似乎最常与那些被认为是位于国际排名顶端的国际机构合作，如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等。这表明，与当地同行相比，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教师可进入的网络可能有助于其相对较高的质量指标。

## 结语

学术机构的发文数量并不完全代表某一机构的科研情况；但它可以提供机构间生产力和质量相对水平的快速预览，以及对学术出版的院校承诺感，这是科研事业的典型组成部分。

这种单一案例表明，如果仅凭科研产出数量来测量科研生产力的话，研究型国际分校可能不具备优于国内机构的内在优势。但是，当考察科研质量指标时，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在这种评价标准下，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跃升至排名第二。这可能是因为这所学校承载着来自其主校的学术期望、并能够利用其本校的知名度以及进入当地机构可能无法获取的网络。

然而，有趣的是，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

校唯一的当地发文合作者是马斯达尔大学，它拥有更多的发文和更高质量的指标。如果引入国际分校的好处是建设本地科研能力，那么为何缺乏本地合作则是需要进一步探索

的问题。虽然我们仍需要更多的信息来解读国际分校的科研成果，但文献计量数据表明，它们不一定是推动本地科研能力建设的快速途径。

## 南苏丹的高等教育：与挑战共存

Kuyok Abol Kuyok

南苏丹朱巴大学 (University of Juba) 教育学院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副教授

电子邮箱: kuyokabol64@hotmail.com

南苏丹于 2011 年 7 月从苏丹独立，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小但最有问题的高等教育系统之一。这个世界上最新的国家有五所公立大学——朱巴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Juba)，加扎勒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ahr el Ghazal)，上尼罗河大学 (Upper Nile University)，约翰·加朗博士纪念科技大学 (Dr. John Garang Memori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及伦拜克大学 (Rumbek University)。这些大学共拥有近 20 000 名学生，其中包括 1 040 名毕业生。还有四所“项目性的”或“规划中的”的公立大学：西赤道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Equatoria, Yambio)，北加扎勒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ahr el Ghazal)，托里科技大学 (Tori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及班图乌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antiu)。

在冲突和经济低迷的激化下，该系统面临着几个挑战，其特点是缺乏实体基础设施、资金不足、严重的工作人员短缺。这些弱点对于大学发挥作用的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公立大学未能满足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促使该国出现了一个无管制的私立大学部门。南苏丹有 13 所私立大学，其中只有 4 所已得到认可。

本文的关注点是五所运作中的公立高等院校的经验。面对现存问题，院校选择有限，但要面对挑战。四个主要方法强调了部门的适应力：敬业的教职人员、院校伙伴关系、支持性的大学治理结构和国际援助。

### 敬业的教职人员

2012 年，大学只有 721 名教师，显现了适度生师比 28: 1。但是，大学极度缺乏合格的学者。朱巴大学是该国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学生占比 66%，在南苏丹独立后失去了 561 名来自北方的教职员工。同样，上尼罗大学和加扎勒河大学在 2010 年 12 月大学回归南方时，这两所 1991 年后的大学中大量的教职人员仍留在喀土穆（即苏丹首都，而非迁移至南苏丹首都朱巴）。此外，该系统以资质不足的教师为主。例如，在学历方面，2012 年，所有教师中只有 86 人获得博士学位。此外，同年编制的员工情况显示，只有 36 名教授是全职教授，62 名是副教授，76 名是助理教授，还有 242 名讲师和 262 名教学助理。为了运行学术课程，大学招收兼职导师。因此，在朱巴大学和加扎勒河大学，2016 年底，分别有 31% 和 60% 的兼职教师。另外三所大学的教职人员情况同样令人担忧。

尽管如此，这些大学雇用了一些国内受教育程度最高、最有经验和才华的群体。严格的大学招聘程序使院校免受公务员系统内在腐败行为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对院校的承诺强调了他们传授知识和提供其他重要服务的能力。学术人员的奉献精神减弱了缺乏合格教师的威胁。例如，加扎勒河省的一名教授要指导 12 名博士生。



## 院校伙伴关系

一般来说, 缺乏基础设施是大学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当院校被遣返到南方时, 三所老牌大学的设施和实验室设备都被留在了喀土穆, 或是在 2013 年 12 月冲突之后被掠夺, 尼罗河大学和约翰·加朗博士纪念科技大学就有这样的遭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几所学校的副校长建立了伙伴关系, 这对于院校的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 虽然约翰·加朗博士纪念科技大学已经重新在波尔开放, 但由于目前马拉卡勒的不安全情况, 上尼罗河大学已被迁至朱巴。流离失所的大学利用朱巴大学的一些设施, 朱巴大学的教授指导学生并在约翰·加朗博士纪念科技大学兼职工作。此外, 伦拜克大学的理工科学生还在瓦哈河的加扎勒河大学开展实验室的实验, 约翰·加朗博士纪念科技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就其实际工作参观朱巴大学。

此外, 其他大学的教授也指导朱巴大学的研究生。为确保工作人员的发展, 大学招收其教职人员攻读由朱巴大学和加扎勒河大学提供的研究生课程。

## 支持性治理

南苏丹的高等教育由高等教育、科学和技术部负责。该部有政策、技术和行政监管。虽然部长是政治委任人员, 但由部长领导的诸如副部长等学者的存在确保了高等院校对其所面临问题持有的意见被考虑在内。

高等教育部主要通过提供政府资助来支持大学。该部门在 2014 年增加了讲师的报酬, 这一措施吸引了一些学者回到大学。朱巴大学的长期工作人数从 2011 年的 251 人增加到 2016 年的 574 人。虽然这表明自 2011 年以来, 教职工人数增长了 56%, 但是, 这一数值仍远低于大学独立前的教职工人数一

—700 人。另外, 通过高等教育部的努力, 一些欧洲和非洲国家为大学教职人员发展计划提供支持。目前, 通过这一举措, 许多学者在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赞比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Zambia) 和津巴布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攻读研究生课程。

此外, 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的大学代表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为各机构提供了一个国家平台。此外, 大学领导们在大学里引入了学院的管理风格。就重大院校事务咨询了教师、学生和支持人员, 加强了大学的内部沟通。在这一方面, 大学确定并反思了校园内部更广泛的问题。

副校长利用他们的关系和政治见解, 为大学获取资源。他们求助于大学理事会成员, 也即那些有影响力的部长或议员, 以便政府部门听取意见。在一个非官方性比官僚程序更具活力的国家, 这种做法往往富有成效。

## 国际援助

高等教育是该国资金最少的政府部门之一。一直以来, 大学收到的年度财政拨款不足 1%。这种微薄的资金限制了大学的运作。大学管理人员谨小慎微地分配人员薪酬, 采购基本服务、书籍一类的学习设备等。由于政府无力资助实体基础设施和员工发展项目, 大学需要依赖外援。

国际援助是解决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两大挑战的最实际的机制: 基础设施不足和教职工短缺。在国际援助下, 大学可以处理基础设施问题。在独立之前, 朱巴大学从国际发展伙伴 (挪威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那里获得了 650 万美元, 用于在 2010 年建立法学院。新建筑为其他学院提供宿舍并提供了一个研究生科研中心。

当时, 87.6% 的教师没有博士学位。因此, 教职人员发展是国际援助议程的首要任务。2011 年初, 朱巴大学同意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the Virginia Polytechnic) 和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Virginia State University) 开展为期三年的合作, 以培训朱巴大学的员工。朱巴大学还于 2015 年 8 月与坦桑尼亚公开大学 (the Open University of Tanzania)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以推动两所院校间的远程学习项目。加沙省大学与乌干达的马克雷雷大学和挪威的奥斯陆大学进行了类似的安排。此外, 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 (Texas's A&M University) 和纽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于

2010 年 6 月与约翰·加朗博士纪念科技大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然而, 战争爆发后, 国际社会暂停向大学提供援助, 因为它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人道主义危机之上。

## 结语

南苏丹的高等教育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虽然大学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但它们采用与之和平共处的策略。这种经验为那些身处冲突后环境中具有相近特征的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 非洲大学工程专业中的性别不平等

Eric Fredua-Kwarteng, Catherine Effah

Eric Fredua-Kwarteng: 加拿大多伦多教育政策顾问

电子邮箱: efredua\_2000@yahoo.ca

Catherine Effah: 加纳国有企业委员会 (the State Enterprises Commission) 顾问

电子邮箱: catherine.effah@yahoo.co.uk

非洲哲学家和教育家詹姆斯·阿格雷 (James Aggrey, 1875~1927) 指出, 如果你教育一个男人, 你教育的只是一个人, 但如果你教育一个女人, 你教育的就是整个家庭, 甚至是一个国家。这一说法表明, 女性教育对非洲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非洲男性为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非洲女性在健康和儿童保育、农业、食品生产、加工和保鲜等领域肩负重大责任, 这是非洲大陆欠发达情况所带来的负担。例如, 非洲农村社区总是无法获得管道水系统和非化石燃料。很多非洲妇女长途跋涉, 为家庭消费取水拾柴。

入学统计数据显示, 在非洲大陆大学的工程项目中, 非洲女性人数很少。例如, 在塞拉利昂大学 (University of Sierra Leone) 的弗拉湾学院 (Fourah Bay College) 中, 尽管在工程项目中的女性入学率有了微弱上升, 但男性入学率仍为 90% 左右。

同样, 在最古老的非洲大学之一, 乌干达的马克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 中, 2 160 名学生在 2009~2010 学年入读工程课程, 其中只有 22% 是女性。在卢旺达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Rwanda), 在 2013/14 学年和 2014/15 学年入读工程学的女性比例分别为 20% 和 19%。加纳矿业技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ines and Technology) 在 2014/15 学年接收了 503 名本科生。女性比例

只有 16%。去年, 这一比例几乎达到了 20%。平均而言, 该大学入学的女大学生百分比徘徊在 15~20% 左右。

女性在非洲大学的工程课程中人数不足不仅是因为缺乏兴趣、能力或智力。其中一些客观原因在于, 科学和数学在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领域; 社会文化习俗优先考虑男性教育而非女性教育; 而中学的科学和教学环境导致了在非洲大学学习工程学科的非洲女性的缺乏。因此, 这显然是一个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涉及工程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分配。

### 性别平等或公平?

大多数非洲大学发布的入学数据展示了男女比例。加纳海岸角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发布了年度入学统计数据和相应的性别分布。例如, 在 1962/63 学年, 共记录了 155 名学生, 只有 8% 的女性。相比之下, 2011/12 学年, 女性入学人数比例为 33%。肯尼亚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 (Jomo Kenyatta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也将其女性入学人数从 2012/13 年的 14% 提高到了 2013/14 年的 29%。喀麦隆雅温得大学 (University of Yaoundé) 也将其 2015/16 年的女性入学人数提高到约 38%, 而去年为 27%。

其他非洲大学的女性入学人数也有所上升。虽然这些统计数字是监测女性进入大学的有用工具，但并没有显示女性就读的课程项目，特别是工程学。这与南非的大学同样相关，其女性入学率平均达到 53%。这样看来，大多数非洲大学更注重数量上的性别平等（gender parity），而忽视了实质上的性别平等（gender equity），后者关注的是每个学术课程，特别是工程学的性别平等和分配。

### 社会公平战略：能做什么

一些非洲大学实施了四项平权行动战略，以提高女性在工程学项目的入学率：

- 录取配额：工程项目学习名额的一定比例专门分配给女性。这一战略的一个常见变化是为那些基本符合入学要求的女学生提供入学机会。虽然加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hana）和坦桑尼亚的达拉斯萨拉姆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ares Salaam）的实证证据支持了这一战略的可行性，但它却被批评为降低学术水平并给女性考试优惠待遇。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据本政策战略被录取的女学生，并未获得成功完成其所选的工程项目所需的学术支持。

- 优先考虑：合格的女性考生优先于男性。这是一个可实施的简单战略，因为它不需要详细的规划。许多非洲大学，特别是矿业技术大学、加纳大学等，已经实施了这项政策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问题在于，该战略本身并不关注女性考生如何获得必要的入学资格。

- 学术升级：该政策的另一版本是，拥有符合入学标准毕业证的女性考生，依据

其愿意参加并通过学术进修项目的方式获得录取。尽管其具备优点，但它专注于知识获取和能力培养，而不是建立信心。

- 有条件录取：根据在第一年课程中获得特定分数的能力，获得合理分数的女考生可被录取。例如，根据在第一年数学课程中获得 70% 或更高分数的要求，在数学上分数达到 75% 的女考生有可能被工程项目录取。该策略往往以对女考生施加过大压力来满足这一条件。

### 未来的路

录取配额、优先考虑、学术升级和有条件录取的平权行动策略对于解决非洲大学工程项目中女性人数不足的问题都很重要。但是，在工程项目招生方面，性别差距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被削弱。两个主要因素，即高中女生入学率及在这一学习阶段中学习科学和数学的女孩面临的困难，必须加以考虑。在性别差距加剧的时候，非洲大学不应该避而远之。它们应该大力宣传女童教育，并以发展伙伴的身份让其观点得以表达。

高中是本科工程课程学生的主要来源。由于缺乏支持性的课堂环境，只有少数在课程上表现良好女生能够获准申请到这些项目；教师在女孩的日常经历之外使用参考指示；他们强烈偏爱男性学生，以及社会科学和数学的男权形象。

作为社区拓展计划的一部分，非洲大学可以通过设计和教授专门针对女孩的科学、数学和技术课程来影响选择工程项目的女中学生人数。这种干预旨在帮助女孩们提升对这些领域的兴趣、技能和信心。

## 蒙古：高等教育与流动

Bryce Loo

美国世界教育服务中心 (World Education Services) 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箱: bloo@wes.org

自从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 在国外的蒙古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国内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持续挑战部分推动了出境学生流动。近年来, 蒙古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近期进行了持续的改革尝试, 但蒙古的高等教育质量仍然不高。入学公平问题, 特别是贫困和农村学生的入学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大多源自长期的政府资金不足。因此, 蒙古严重依赖国际捐助组织, 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来应对这些持续的挑战。

如能进行有效管理, 学生流动可使蒙古受益。回国的学生可以把他们在国外获得的技能和经验带回, 并帮助其返回的院校实现国际化。在许多方面, 蒙古提供了针对人口较少国家管理学生流动带来的挑战和机会的见解, 让它们获益匪浅。

### 蒙古的高等教育

蒙古的教育指标与发达邻国相同, 特别是从转型以来, 高等教育大幅扩张。2015 年, 蒙古院校招收了 162 626 名学生, 毛入学率为 68%。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毛入学率只有约 14%。学生大多是女性, 这反映了该国已形成的性别差距。

院校的数量也出现了类似的强劲增长。公立院校仍然很优秀, 最近有 42 所院校整合为 16 所。私立院校数量急速增加, 2015 年已有 78 所私立院校, 但大多学校的入学人口数量很少。

### 出境学生流动趋势

在冷战时期, 绝大多数蒙古人选择在苏联或苏维埃国家留学。2014 年, 主要的留学目的国变得更加多样化: 中国、韩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目前有超过 15 000 名蒙古人在国外学习。尽管与主要派遣国相比, 这个数字相对较小, 但对于只有 300 万人左右的国家而言, 这一数字则是相当高了。只有一些上层阶级家庭 (主要是在首都乌兰巴托), 才有可能全面资助这样的教育, 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接受教育。蒙古政府每年派出少数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学生, 以及大量申请贷款的学生。此外, 相当多的学生会去特定的国家, 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 大部分或是完全由双边奖学金计划全额资助。一小部分蒙古人能够获得蒙古非政府组织和公司以及外国政府和接收院校提供的奖学金。

### 人才流失和循环

蒙古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很有可能出现人才流失。首先, 对于留在国外的蒙古学生和学者的人数不甚了解。最近一个已知的政府方面的估计显示, 从 2010 年起, 有超过 107 000 名蒙古人居住在国外。特别是学生迁移开辟了更广泛的移民形式, 常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迁移。2011 年前后, 蒙古经济蓬勃发展, 是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以世界迅速发展的矿业为主体。人们认为这

个梦幻般的增长已吸引了很多旅居海外的人士。然而，蒙古经济近来停滞不前。这有可能阻止一些在国外的蒙古人回国，并刺激了許多人移居国外。

除了了解问题的范围之外，蒙古应该探索应对人才外流的方案。一些选项涉及激励学生毕业后回国。政府对该部门的资助对于防止有才华的学生和学者的损失至关重要。更多的研发预算可以激励博士生和学者回国。除了更高的工资，向回国的学生提供就业服务等激励措施可能有所帮助，诸如中国等一些国家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学生和学者不愿意返回的情况下，蒙古高等教育仍可通过“人才循环”或科研协作和知识共享，找到从这些海外人员身上受益的途径。

### 农村学生入学机会

如何帮助农村弱势学生获得国际机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位于乌兰巴托，大部分国家的财政和社会资源也都集中在那里。蒙古也经历了长期从农村到城市高密度的人口迁移，许多个人和家庭从农村迁移到乌兰巴托等几个城市中心。现在，蒙古人口中有近一半居住在首都。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有多少农村学生能够获得国际学习机会，但对于这些学生面临的障碍却是相当清楚的。大多数在农村中学或高等院校学习的农村学生往往无法获得与乌兰巴托的学生相同的信息资源，因为乌兰巴托是大多数咨询中心的所在地。这些学生通常缺少走出国门的家庭和朋友，特别是出于教育目的出国。尽管英语现在是各阶段课程的必修项，但农村的英语水平及其他外语的普及程度明显低于首都等主要城市。支付国

际教育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 奖学金

政府及其子部门可以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提供奖学金。目前，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政府颁发了少数外国留学奖学金，针对的是被泰晤士教育排名中百强大学录取的学生。相对较少的学生能够从这一计划中获益，大多数学生很可能来自乌兰巴托或其他几个主要城市。

蒙古政府也许可以通过开放更多的短期学习机会，派送更多学生出国。与巴西的“无国界科学计划”（Science Without Borders program）类似，政府可以资助学生一年的学术学习，以及任何必要的密集的语言培训和实习。毕业生和研究生课程可以利用蒙古院校与外国大学的现有伙伴关系。

这一方案可以为学生开放更多的出国留学机会，包括提供给农村院校中符合条件的学生。通过与主办国的组织合作，可以帮助安置学生，学生可以进入多种多样的院校，而不是仅限于那些筛选条件最为严苛的学校。也许最重要的是，通过将留学机会与国内学位课程结合在一起，蒙古可以留住更多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

### 下一步计划

显然，我们需要收集更多数据并开展研究，特别是针对学生流动，并了解在蒙古发生这种流动的更广泛的社会、教育背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蒙古更好地管理学生流动，让高等教育体系和国家受益。在这一领域的知情决策对蒙古相当重要，有助于其从接受国际教育的公民中获得最大益处。

## 跨境学习：数据给予我们的信息

Rachael Merola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 (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rachael.merola@obhe.org

远程学习、MOOCs 以及混合式在线授课模式提供了跨境教育的新途径，学生无需实际出现在课堂上，这些学习方式也被视为跨境教育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中潜在的游戏变革者。鉴于跨境教育受到的关注，根据数据显示的此类市场的规模如何呢？特别是在那些国际学生接收国和派出国中，究竟存在多少国际学生？又有什么证据表明学生正越来越多地转向跨境网络教育呢？

### 来自主要主办国的数据

美国拥有最多的国际学生，大多数大学至少提供一些在线学习。WCET 远程教育入学报告 (the WCET Distance Education Enrollment Report) 采用 2014 年秋季教育综合数据系统 (IPEDS) 数据，报告数据显示，七分之一的高等教育学生 (14%) 通过远程教育完成了所有课程。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 (28%) 修读至少一门远程课程。

此外，在 2012 年秋季至 2014 年秋季期间，根据联邦数据收集的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境外只就读远程教育课程学生的入学率增长了 8.6%，增加了超过 35 000 名学生。这一数值超过了国内学生参与远程教育的入学人数 (在此期间增加约 7% 的学生)。同时，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下降了 2%。

在线课程入学人数的增长与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下降形成对比，表明网络教育正成为更受学生欢迎的选择，尽管国际学生占远

程教育总入学人数很小一部分。在 2014 年入读远程教育的 2 858 792 人中，只有 1.3% (37 788 名学生) 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余的是国内学生 (2 730 769 人) 或从未指明地点 (90 235 人) 注册入学的学生。

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市场，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跨境网络教育。美国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在 2012/13 学年到 2014/15 学年两年间增长了 16%，在 2014/15 学年，学生人数高达 854 639 人，这比跨境在线学习市场的增速更快。虽然增长明显，但被视为美国更大国际学生高等教育市场的一部分，跨境在线学习似乎并没有获得巨大的发展势头。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英国会发现，该国国际学生人数排名第二，表明了远程学习市场的多样化。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的数据显示，英国远程教育学生人数从 2013/14 学年的 210 005 人降至 2014/15 学年的 189 865 人，下降了 10%。据 2016 年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报道，这一下降趋势可能与因学生资助变化而导致的非全日制入学人数的减少有关：在英格兰，高等教育非全日制入学率在过去五年中下降了 41%，表明 20 万名学生不再入学。开放大学是最大的远程教育提供者，主要招收非全日制学生，自 2009/10 学年以来，已失去了学生群体的三分之一。

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描述，入读英国远程学习课程的海外学生人数从

2013/14 学年的 119 700 人略升至 2014/15 学年的 120 475 人, 其中不包括大量入读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会计学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 他们有时被称为“远程学生”。该学位是与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又简称为 ACCA) 合作提供的, 自动将大部分会员注册到学位课程之中。这被视为是在人为夸大英国跨境教育数字。

最近, 有关跨境教育的高等教育全球报告发现, 英国跨境远程/在线学习项目中有 70% 是在 2000 年之前首次授课的, 且只有 4% 的远程招生是在 2010 年之后开发的学习项目中。这表明远程学习最近几年并没有增长。

## 主要来源国

是否有证据表明, 在有较高出境学生流动的国家, 在线和远程学习正成为愈发具备吸引力的学习选择? 国际学生的两大主要来源国, 即印度和中国, 是在线和远程学习的活跃市场, 尽管它们没有专门发布有关跨境在线学习的数据。两国在远程学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提供了包括海外留学在内的面对面学习的替代方案。

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的统计, 2014/15 学年, 印度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已达 2 650 万人。虽然委员会并未公布有关远程学习的资料, 但其他估计和预测却是乐观的。科研公司 TechNavio 估计, 印度各阶段教育的远程学习入学人数为 542 万人, 入学人数预计将在 2019 年增长 10%。2014 年, 印度的在线教育市场价值达到 200 亿美元, 收入将在 2019 年增长 25%, 全国 140 家网络学习公司中有 100 家在过去三年中成立, 显示了该行业的增长。

远程教育供应的增长遍布所有部门, 包

括国家公立大学, 如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 (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一所成立于 1985 年的远程学习大学, 拥有 70 多万名学生。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外国大学通过 EdX 等平台提供课程。事实上, 在美国之后, 印度在 EdX 课程中的入学人数排名第二。虽然这表明在线学习的增长, 但并不一定表明学生选择了远程学习而不是面对面学习, 无论课程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院校。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过去十年的入学人数增加了六倍, 学生人数超过 3 300 万人。据研究机构 Ambient Insight 集团介绍, 截至 2014 年底, 已有 528 万名学生 (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 16%) 入读在线课程。

另有估计显示, 2015 年, 中国网络学习收入达 58 亿美元, 占全国教育支出的 22%。这一数据指的是各阶段教育的网络学习; 有关在线高等教育的数据没有被收集。2014 年 1 月, 中国教育部暂时取消了其必须批准所有在线学位课程的规定。外国大学在中国提供在线学位课程仍属非法, 2014 年, 全国有 68 所国内大学拥有在线学习机构。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增加全国在线教育的机会。2015 年 5 月, 习近平主席呼吁“符合信息技术发展的教育改革创新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接受教育”。尽管要求教育得到发展, 但中国 2016 年 4 月的高等教育质量报告 (是教育部此类报告的首例) 并没有提及远程或在线学生。

## 需要更全面的数据

在美国和英国, 跨境高等教育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入学人数有增长的迹象, 更全面的数据将加深对带来这



一增长原因的了解。在印度和中国，网络教育市场蓬勃发展，尽管缺乏专门针对跨境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数据，但国内该领域的增长表明了实际需求。

然而，仍然有人认为在线教育拖累了传统的国际学生流动，这一说法还为时过早。在中国和印度，外国在线学位无法得到认证，

无疑限制了在线教育的吸引力。可能正是通过混合教育的形式，在线学校将开始在跨境高等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本文首先刊登于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网站：[www.obhe.ac.uk](http://www.obhe.ac.uk)。

## 巴西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困境

Marcelo Knobel, Robert Verhine

Marcelo Knobel: 巴西国家纳米技术实验室 (Brazilian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Laboratory) 主任、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Campinas, UNICAMP) 格尔布·沃塔物理研究所 (Instituto de Física Gleb Wataghin) 教授

电子邮箱: knobel@ifi.unicamp.br

Robert Verhine: 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 (Federal University of Bahia) 教育学院 (Faculdade de Educação) 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巴西莱曼教育创业与创新中心 (Lemann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Brazil)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rverhine@gmail.com

巴西拥有世界第九大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人口约 1.95 亿, 分布在 26 个州和一个联邦区的 5 000 多个城市。该国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高等教育体系, 公立研究型大学数量相对较少, 却有着大量的私立院校。虽然这一系统在过去 15 年中一直迅速发展, 但入读大学的青年人比例仍少于 18~24 岁年龄群体的 20%。约有 750 万学生入读巴西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学生中有 75% 的人进入了私立院校, 或许更为显著的是, 大约一半的私营部门入学者都在营利性院校学习。

五十年前, 像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样, 巴西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公立的。巴西的公立大学以科研为导向, 仍然免收学费, 但由于成本高昂和政府资源有限, 公共部门的扩张受到严重限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巴西决策者依靠私营部门来应对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 推动院校授权并提供有吸引力的财政奖励。联邦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进一步加强了这项政策, 当时法律开始允许创建营利性院校。教育企业家和投资者迅速创建了新的营利性机构, 并将许多老牌院校从非营利转变为营利性机构。凤凰城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Phoenix) 于 2001 年进入巴西市场, 虽然它在 2006 年退出巴西, 但它的存在为其他大型跨国机构的进入奠定了基础。2005 年后, 转向更多营利机构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推动, 其中包括: 该国联邦学生贷款计划的扩大, 使用巴西股市筹集投资资金, 以及采用联邦计划对那些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的私立院校免税。奥巴马政府出台的加强美国营利性部门的监管似乎也为巴西营利性院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为一些北美教育机构将活动转移到提供有利法律环境的国外。

### 当前私营部门的趋势

许多国家不允许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在美国, 营利性院校的扩张已被广泛 (且批评性地) 记录下来, 但该部门只占该国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的 10% 左右。营利性高等教育在中国也很普遍, 但主要侧重于非学位的职业教育。在世界各地, 如果存在的话, 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往往是地位低下的机构, 通常招收那些被排除在大多数公立和非营利机构之外的“非传统”学生。来自巴西的教

育普查数据显示,与高等教育学生整体相比,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者往往年龄较大,更有可能是已工作人群,而且不成比例的来自低收入家庭,且此前在高等教育阶段没有学习经历。

当前,巴西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其后果之一是自 2015 年以来,联邦补助学生贷款的可用性大幅减少。因此,许多营利性院校遭受重大的财务打击,导致其管理层方面希望与一个或多个竞争对手合并的意愿。这些合并重新塑造了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有助于形成那些被证明是获利丰厚的大型教育机构。2015 年,巴西高等教育营利部门的净收入约为 140 亿美元。这一收入中约有 36% 来自 12 个占总市场份额近 30% 的大型教育集团,年利润率高于 21%。该国的私立教育部门现在是巴西经济的第十大组成部分。最近宣布的科若顿教育集团(Kroton Educacional)和埃斯塔·西奥德大学(Universidade Estácio de Sá)的合并将带来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组建,可能招收 200 多万名学生。

## 新的高等教育巨头

新的教育巨头将破坏该领域的稳定性,创造比许多竞争对手大得多的公司,并将大部分的政府学生贷款集中在少数机构中。尽管它们声称经济目标永远不会优先于社会承诺,但其他部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短期经济利益的渴望多过于长期教育目标。这意味着教育作为公共物品的概念可能会以快速经济回报的名义而被破坏。

到目前为止,巴西营利性高等教育的质

量特别可疑。营利性院校在正式学生学习指标上往往低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同时还面临与基础设施、教师资格和财务可持续性有关的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大部分营利性院校的学生都入读了法律、教育、行政管理 and 人文学科领域的低学费项目。这些学位课程常常需要较大的教室、但只能提供教师低水平的工资、常常降低学术期望,并缺乏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辍学率的政策。

这些项目的质量进一步受到过快增长的威胁,增长超过了政府通过复杂的国家系统来评估项目和机构从而维持最低标准的努力。国家评估系统没有以特定的方式解决营利现象,而是统一适用于所有的高等教育供给者。此外,政府的评估过程侧重于毕业生的表现,而不是整个学生团体的表现。由于营利性院校中的许多学生一直未毕业,他们在评估过程中被遗漏,所以更难发现缺陷。虽然营利性教育的倡导者认为,该部门引入了更好的管理,为更大的物质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但这些要求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

高等教育部门的营利性增长趋势显然是令人担忧的。新建的高等教育巨头带来的整体影响仍不清楚。小型、私立、非营利性高等院校能够竞争和生存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满足当地需求?营利性院校是否计划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或拉美之外呢?政府如何处理针对高等教育行业巨头的评估和监管呢?这些强大的教育团体进行的游说和政治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是巴西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世界应该关注正在发生的情况,因为巴西营利性高等教育部门的兴起肯定是全球趋势的先兆。

## 哥伦比亚：快速变化的挑战

Ivan F. Pacheco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人员、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及哥伦比亚教育部顾问

电子邮箱: ivanfpackeco@gmail.com

“你看，你要用尽全力奔跑，才能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如果你想去另一个地方，那你奔跑的速度至少得是原来的两倍！”

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中，“红桃皇后”对爱丽丝说的话表明了世界各国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变化来得太快，政府和大学通常无法快速适应这种变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哥伦比亚也不例外。政府最近的建议是雄心勃勃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改革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但大多数总统的任期却很短暂。

### 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

哥伦比亚一直是创新和先进教育政策的领导者。ICETEX 是政府的学生贷款机构，是此类机构的世界首例，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首批建立认证机构的国家之一。然而，哥伦比亚正在努力引入政策来跟上高等教育的变化。

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 (Juan Manuel Santos) 总统的 2014~2018 年国家发展计划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比此前的任何国家发展计划都更重视教育。在第六章题为《哥伦比亚：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中，政府制定了教育战略。高等教育和科研在国家

发展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优先考虑教育、科研和生产部门之间更加流畅的相互作用。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几十年来，学术界和生产部门之间富有成效的关系是令人难以捉摸的。

### 一个连贯的综合系统

桑托斯的国家发展计划正在提出新的举措，以发展更加连贯的高等教育系统，其中许多举措已在其他国家成功实施。这些举措包括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建立（学术）学分的累积和转移制度；建立国家质量体系。

尽管质量保证体系的改革指向许多先前存在的结构和过程的重组，可能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来实施，但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将需要很多年，甚至是十几年才能实现。

“国家资格框架”提供了一种结构，以便根据其相应的资格（包括学习成果）来组织教育层级。在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等国家的教育和培训的资格管理方面，这些框架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在拉丁美洲、智利和厄瓜多尔已经开展了类似的项目，结果不一。经验表明，这是一项长期事业。在其他国家，整个过程耗费了几十年才得以成功实施。

哥伦比亚提出的资格框架包括所有层次和类型的教育（类似于澳大利亚模式）。目前，

高等教育体系不同层次的差异尚不清楚。例如，“专业技术人员”（técnico profesional）学位学术课程与“技术专家”（tecnólogo）学位学术课程之间的区别对于公众来说是不甚明了的，有时甚至连专家也不清楚。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些专业（研究生课程）和硕士学位课程中。如果资格框架有助于在每种类型的课程间界定明确的区别，同时能够促进它们之间的流动，那么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学分累积和转移系统是对其迅速施行提出挑战的另一个策略。墨西哥和智利最近开发了学术学分转移工具。在墨西哥，全国大学协会（ANUIES）的一项举措为大学成员之间的学术流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同样，在智利，智利大学校长委员会（Council of Rectors of Chilean Universities）创建了可转移学分制。这两项举措不仅需要多年才能发展，而且它们仅包括那些自愿参与的院校，不包括非大学机构。哥伦比亚的做法更加雄心勃勃，增加了复杂性：该系统旨在促进不同行业的流动，包括非正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此类大学。参与也是强制性的，虽然这还没有定下来。

国家发展计划在“构建”高等教育系统方面的宣言引起了混乱，特别是因为哥伦比亚广泛的共识是“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存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系统”与拟议的“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差异尚不明确。教育部宣称，这一变革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两条相互联系的路径（称为“支柱”）：大学教育支柱和技术教育支柱，来提升国家技术教育的现状。两大支柱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在理论上可能很简单，但整合的实际意义已被证明更为复杂。

## 变革的政治

哥伦比亚国家发展计划提出的大多数战略和系统的相关性不可否认。然而，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一些想法和举措需要时间才能变得成熟和得以发展，并被不同利益相关者所接受。这一改革水平与一个时间有限的政府不相符，也跟不上学术界接受改革的步伐。在2018年前启动这一雄心勃勃的改革，致使桑托斯政府面临压力（桑托斯不能再度当选）。然而，政府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提出这一建议的教育部长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最近辞职了。新晋部长誓言要继续努力，但道路曲折且为时不多。有趣的是，该项目的领导层似乎正在从教育部转向劳工部和“国家学习服务中心”（the National Learning Service），这是一个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高等教育的政府机构。

如不与许多其他利益相关方（当然也包括大学）接洽，政府无法在多个方面执行改革。尽管有些机构支持计划的某些内容，但桑托斯政府还没有成功地传达计划中的改革；改革的整个范围和潜在影响尚未得以完全了解。

桑托斯政府只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了。教育部已经开始努力实现发展规划的目标，但对于所剩无几的时间，这仍是雄心勃勃的。现在是评估在这个短时期内可以实现的内容并对其进行关注的时候了。更有野心的做法可能导致改革失败。大仲马（Dumas）说，“匆忙是个糟糕的顾问”，或者用白兔的话来说，“越匆忙，越落后”。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世界银行及教育部无关。

## 新书速递

- Atherton, Graeme, ed.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Global Inequalitie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72 pp. £29.99 (pb). ISBN 9781137411891. Website: <http://www.palgrave.com>.
- Aune, Kristin, and Jacqueline Stevenson, eds. *Relig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6. 226 pp. £28.99 (pb). ISBN 9781138652958. Web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 Burke, Penny Jane, Gill Crozier, and Lauren Ila Misiaszek. *Changing Pedagogical Spaces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6. 180 pp. £26.99 (pb). ISBN 9781138917224. Web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 Cross, Michael, and Amasa Ndofirepi, eds. *Knowledge and Change in African Universities: Volume 1 - Current Debates*. Singapore: Springer, 2016. 220 pp. \$39.99 (ebook). ISBN 978-94-6300-842-6. Website: [www.springer.com](http://www.springer.com).
- Cross, Michael, and Amasa Ndofirepi, eds. *Knowledge and Change in African Universities: Volume 2 - Re-imagining the Terrain*. Singapore: Springer, 2016. 198 pp. \$39.99 (ebook). ISBN 978-94-6300-842-6. Website: [www.springer.com](http://www.springer.com).
- De Wit, Hans, Jocelyne Gacel-Ávila, Elspeth Jones, and Nico Jooste,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Emerging Voices and Perspectives*. Abington, UK: Routledge, 2017. 268 pp. £29.99 (pb). ISBN 9781138100664. Web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 Douglass, John Aubrey, ed. *The New Flagship University: Changing the Paradigm from Global Ranking to National Relevanc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17 pp. \$100 (hb). ISBN 978-1-137-50049-6. Website: <http://www.palgrave.com>.
- Goddard, John, Ellen Hazelkorn, Louise Kempton, and Paul Vallance, eds. *The Civic University: The Policy and Leadership Challeng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6. 352 pp. \$130.50 (hb). ISBN 9781784717711. Website: [www.e-elgar.com](http://www.e-elgar.com).
- Goldrick-Rab, Sara. *Paying the Price: College Costs, Financial Aid, and 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368 pp. \$27.50. (cloth). ISBN 978-0-2264-0434-9. Website: [press.uchicago.edu/](http://press.uchicago.edu/).
- Killick, Davi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Palgrave, 2017. 226 pp. £32.99 (pb). ISBN 9781137526168. Website: [www.palgrave.com](http://www.palgrave.com).
- Kobylarek, Aleksander. *The Polish Humboldtian University in the Face of Paradigmatic Change*. Newcastle upon Tyn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7. 255 pp. £61.99 (hb). ISBN 1-4438-4703-8.

Website: [www.cambridgescholars.com](http://www.cambridgescholars.com).

Liu, Nian Cai, Ying Cheng, and Qi Wang, eds. *Matching Visibility and Performance: A Standing Challenge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16. 251 pp. \$54.00 (pb). ISBN 9789463007719.

Web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http://www.sensepublishers.com).

Marginson, Simo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mmon Good*. Carlton,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16. \$59.99 (pb). ISBN 9780522871098. Website: [www.mup.com.au](http://www.mup.com.au).

Martin, James, James E. Samels & Associates. *Consolidating Colleges and Merging Universities: New Strateg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7. 272 pp. \$39.95 (hb). ISBN 9781421421674.

Website: [jhupbooks.press.jhu.edu](http://jhupbooks.press.jhu.edu).

Menand, Louis, Pal Reitter, and Chad Wellmon, eds. *The Rise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 Sourceboo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400 pp. \$32.50 (pb). ISBN 9780226414713. Website: [press.uchicago.edu](http://press.uchicago.edu).

Mountford-Zimdars, Anna, and Neil Harrison, eds.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6. £29.99 (pb). ISBN 9781138924116.

Web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Natow, Rebecca S. *Higher Education Rulemaking: The Politics of Creating Regulatory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7. 216 pp. \$55 (hb). ISBN 9781421421469.

Website: [jhupbooks.press.jhu.edu](http://jhupbooks.press.jhu.edu).

Roberts, Dennis C., and Susan R. Komives, eds. *Enhancing Studen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Hoboken, NJ: Wiley, 2016. 120 pp. \$29.00 (pb). ISBN 978-1-119-31129-4. Website: [www.wiley.com](http://www.wiley.com).

Samuel, Michael A., Rubby Dhunpath, and Nyna Amin, eds. *Disrupting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Undoing Cognitive Damage*.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16. 328 pp. \$54.00 (pb). ISBN 9789463008945.

Web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http://www.sensepublishers.com).

Sica, Alan. *Book Matter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Literac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16. 274. \$69.95 (hb). ISBN 978-1-4128-6432-9.

Website: [www.transactionpub.com](http://www.transactionpub.com).

Teixeira, Pedro N., Sunwoong Kim, Pablo Landoni, and Zulfiqar Gilani. *Rethinking the Public-Private Mix in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Trends and National Policy Challenges*.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17. 200 pp. (hb). ISBN 9463009108.

Web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http://www.sensepublishers.com).

编者注:《国际高等教育》不再出版书籍的简短摘要,而是提供更全面的新书列表,这些书籍均是高等教育读者所感兴趣的。我们欢迎读者提供有关高等教育书籍的建议,特别是针对在美国和英国以外出版的书籍。此列表由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生助理蔡志华(Edward Choi)编制。

